

聊斋闲品

文化漫笔

诗酒趁年华

陈鲁民

东坡居士在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里有名句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莫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，姑且点上新火来烹煮一杯刚采的新茶，作诗醉酒都要趁年华尚在啊！其中最能动人心魄的，大概就是“诗酒趁年华”这一句。

作家张爱玲曾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出名要趁早！”虽功利心太强，但也可视为对“诗酒趁年华”的通俗注解。人一旦出名，自然到处都有美酒鲜花等着你，想一日三醉都没问题。但你凭什么出名呢？还不是靠诗书文章，建功立业。而不论是文还是行武，是著书立说、写诗吟词、攻城略地、勒石燕然，还是文人雅集、勾栏买醉、游街夸官、军营言志，也都要趁年华正轻。年轻才有这个心气儿，这个干劲儿，这个豪兴，自然也有更大的可行性。

年轻是欢饮的资本。人生苦短，青春易逝。无怪乎曹孟德会生出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的无限感慨。“醉里挑灯看剑”，则是辛弃疾正当年时的豪迈之声，再老上十岁试试，还会有这样的激情？日前，我和几个老友小聚，喝了一个时辰，一瓶白酒还没喝完，真是喝不动了。想当年，三十来岁时在一起小酌，一人喝一瓶白酒还不过瘾，最后要来几瓶啤酒来“涮涮喉咙”，这才志得意满地各回各家，还都骑着自行车，既不迷路也不摔跤。

拳怕少壮，酒也怕少壮。若上了年纪，就千万不要和年轻人斗酒，因为你没这个资本了。年轻人醉了，睡上一觉，第二天啥也不耽误，照样生龙活虎，该干嘛干嘛。老年人没个两三天就缓不过来，弄不好就喝进医院。人谁都有年轻的时候，二十郎当岁时，我在湖北神农架大山里当兵，因过年买不到酒，还曾喝过医用酒精，也照样高兴得大呼小叫，尽兴而归。

年轻更是写诗的本钱。李白的“斗酒诗百篇”，杜甫的“三更不别”，都是“趁年华”的佳作。更不待说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李贺的《梦天》《雁门太守行》，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等，也都是“趁年华”的产物。年轻，锐气逼人，敢想敢干，充满创作激情，没有条条框框，不知天高地厚；又有不知疲倦的精力，不甘寂寞的劲头；再加上才华横溢，感情丰富，诗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心里流出。

南怀瑾先生有名联：“三千年读史，不外功名利禄；九万里悟道，总归诗酒田园。”既明白如话，又深刻之极。功名利禄固然很俗气，但没有功名利禄作基础，诗酒田园也难以高雅起来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下去。因而，那些醉心于诗酒田园的人，也要“趁年华”先努力工作，挣回一份功名利禄才是个正事。开创田园诗派的陶渊明，不是还得自己种地养活自己，“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”。

如今有一句话很时髦：不奋斗，无青春。奋斗同样也要“趁年华”。奋斗的青年人，勇敢无畏，自信自强，“气吞万里如虎”，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。人到中年，不少人就渐无奋斗激情，开始屈从命运安排，或干脆变成油腻大叔；人入老境，则大多都失去了奋斗的力量。说好听点叫“志在千里”，其实也就是有心无力，想想而已，只剩忆旧了。一个人如果在该奋斗的时候没有“趁年华”，做出一番事业，大好的时光都蹉跎过去，一事无成，碌碌无为，这辈子也就算是白过了，老了一定会后悔的。

“父亲山，母亲河，始祖地，国之初。读懂中国，从郑州开始。”山河祖国“欢迎您！”这是央视播出的郑州形象宣传词。“山河祖国”短短四个字，把郑州悠久的历史“浓缩打包”，既真实形象，又简明扼要地传递给了全中国、全世界。但是，这只是郑州这坛千年老酒“散发”出来的一股强烈的“香味”。当客人真要进一步把坛盖打开，倒出来一杯供客人品尝，即以真材实料回答他们何为“山河祖国”。

王者，位于登封的中华父亲山嵩山也。中华大地上名山众多，何以嵩山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？应该说，嵩山的地位如同他的身份一样，是天造地设的结果。嵩山有36亿年的山龄，是地球上最早从海平面下抬升起来的山脉之一。嵩山地处天下之中，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这里喷薄而出。他的名字不仅最早出现在中国最早的典籍《诗经》里，还出现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里。在殷商卜辞里独称嵩山为“岳”，谓“群山之首”。

嵩山的伟大，或者说嵩山文化，可以用十个“之”概括：即万山之祖、千水之源、始祖之乡、民族之根、文明之宗、文化之基、天地之中、功夫之都、三教之交、五岳之尊。

说嵩山是万山之祖，这个都承认。确实，36亿年的山龄，谁也比不了，但他咋就成了“千水之宗”了？其实，这还真不是问题。山水相连，水随山走；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老。就拿发源于嵩山（少室山）的淮河第一大支流颍河来说吧，她的河龄应当与嵩山一样长。那嵩山不就是“千水之宗”吗？

河者，流经9省区的中华母亲河黄河也。黄河流域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不言而喻，黄河是众望所归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由此，我们也把华夏文明称为黄河文明。如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河流文明都有中心一样，黄河文明的中心在河洛地区，由此又有河洛文化之说。河洛文化的大致范围就是以洛河汇入黄河的洛沟为中轴的文化圈，西起三门峡，东至商丘，北至晋冀之南，南至豫南鄂北。在这

“夏浅胜春最可人”，可人的是“阴交夏木繁”的草木蓬勃，可人的是“麦随风里熟”的丰收景象，可人的也是“瓜果堆珠玉”的香色鲜艳。初夏，方品尝过“立夏”时节的樱桃，便又盼着“小满”时节的枇杷……

“小满枇杷半坡黄”，“小满”前后是枇杷成熟期。约半月前，超市就有从江浙等地贩来的枇杷上架，一颗颗黄澄澄、金灿灿。柔和的灯光映照下，果皮上一层细细的绒毛，似乎仍挂着薄薄的晨露。嫩黄如玉，吹弹得破，格外诱人。但我没有急着尝鲜，因为我在等着办公楼前这几棵枇杷树上的果子。

很明显，这几棵枇杷树上的果子晚熟了。今年“小满”已过去七八日，枝头的枇杷仍是青绿如初。树不急，我亦不躁。每天依然常伫于二楼办公室的窗前，俯视着眼前这一片葱郁、一片葳蕤、一片碧绿，尽情享受着初夏满目的绿意。

细细想来，这些枇杷树移植至此应有六七年的光景。最初两年，婆婆娑娑的。也就是最近两年，渐渐显得与众不同。楼前的枇杷树共有八株，均是四五米高，但棵棵树形秀美，老干粗壮。棕褐色枝条随性地向四周舒展，与婆娑的绿叶，共同装扮出一个个庞大葱茏的树冠，正所谓“亭亭如盖矣”。

记得《千字文》中有“枇杷晚翠”一句。枇杷是蔷薇科枇杷属的常绿乔木，四季叶茂枝繁。即便深冬依旧枝叶苍翠，正合“晚翠”二字。而我最早注意到这几棵枇杷树，是在三年前的隆冬。

凛冽寒风中，办公楼前的柳树杨树早已枝枯叶凋。而在一片萧瑟中，枇杷树依然神采奕奕，独守着盎然的深绿。或是七八片叶子，或是十多片叶子，围拢在枝端，远看如一把把撑开的绿伞。尤其是这一片片椭圆形叶子，宽大光滑、厚实如革，正如杨万里在诗中写到的“大叶耸长耳”，实在是憨萌得可爱。相传，秦时琵琶初入中原时，因与枇杷叶形相近，便以“枇杷”名之。魏晋时方有书区分，方才仿着琴瑟的字形字意，专名为“琵琶”。我也是在前些日子，偶尔看了相关资料方才知道，虽枇杷树的叶和果，均

从郑州读懂中国

宋宗桃

片区域里，不仅古文化遗址遍布，还有夏商周三代之都。相传伏羲在洛沟画出了八卦图，而且河图洛书也出自这里。尤其是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，这里就有郑州、洛阳、安阳、开封。河洛地区堪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。

祖者，五千年前诞生于轩辕之丘——今新郑的黄帝也。黄帝号轩辕氏，本姓公孙，后改姬姓，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，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，五帝之首，被尊为中华“人文始祖”。黄帝先是统一了华夏诸部落，而后征服东夷、九黎族，进而统一中华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地理和文化版图。黄帝在位期间，播百谷草木，始制衣冠、建舟车、定律历，文字、算数、医学、音乐等，皆相继发明。黄帝定都于有熊（一般认为是河南新郑）。汉代在新郑北关轩辕丘前建有轩辕故里祠。黄帝出生于三月三日。春秋时代的典籍中就有三月三登具茨山朝拜黄帝的记载，唐代以后渐成定制。自2006年开始，升格为“黄帝故里拜祖大典”。

国者，位于巩义的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也。该遗址也称双槐树遗址，2020年5月，经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，认定其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。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，专家建议命名为“河洛古国”。河洛古国建筑规模宏大，布局严谨有序，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文化观念，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，北斗九星与“天下第一”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，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沿袭传承，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愈加清晰。河洛古国就位于洛沟东边，其呈现出的景象与内蕴，契合了《易经》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的记载。著名学者李伯谦认为，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，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。

通过解读“山河祖国”，就不难理解，郑州为什么是进入中国的“门户”。正所谓“读懂中国，从郑州开始”也。

荐书架

《云水襟怀》：以文化的笔触抒写历史

梁谷

我青年作家张向前一直致力于散文创作，近日，他的个人散文集《云水襟怀》出版。《云水襟怀》收录作者近几年创作的56篇佳作，包括历史文化散文、亲情散文、乡土散文等。历史文化散文占的篇幅相对较大，作者这几年注重以双脚叩响大地，在行走中体悟，在行走中壮大文化生命气魄，用温情的目光抚摸风物，以文化的笔触抒写历史，以哲学的纬度亲近过往。亲情散文从细微处体现人间真爱，散发人性光芒。乡土散文则在旅居异乡的回眸处，抛撒生命的牵挂与回望，以书写家乡的方式抵达故乡，给人一种来自心底的暖意。

著名作家王剑冰在为该书作序时说，语言是文章的生命，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能力。向前首先的自觉，就是对语言运用的谨慎与认真。翻看他的作品，往往能让视线停驻在某一处语言的景象中。写作的自觉是很重要的，自觉能够始终保持清醒，即使听到不同声音，也会明晓而及时修正……不追求数量，而在意质量；不喜听表面嘉许，而在乎背后评价；不索取暂时赞誉，而追求长久播扬。总之，向前的这部融入多年心血的著作，确立了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。在这个语词喧嚣的时代，他以一种冷静的态度，独立煎熬，精心打造，保留了对汉语文字的敬意。

人与自然

晚熟的枇杷

韩红军

有清热、润肺、止咳、化痰之功效，“川贝枇杷膏”中，主要入药的也是这厚实的枇杷叶。

冬日午间，趁着日暖，我会到枇杷树下散步。望着枝头一片片底端圆润、叶柄尖细、状如琵琶的叶子，口中也不禁吟出“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”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等先贤诗句。边吟边行，只觉暖阳下不但绿意横流，也是暗香浮动。细寻之下，方才发现这丝丝的清香，是从枇杷树锈红色的枝尖上飘来的。

枇杷树也是在冬天开花啊！我不禁惊叹。只见在绿叶映衬下，一朵朵米白色的小花，鹅黄清丽，香味幽袅。玲珑的花朵团团簇簇，挤挤挨挨，“凌霜不凋，花冠霜雪而愈繁”。它的花香，也颇为奇特，有专家精辟地描述为“似丁香与棣花味道，亦略似樱桃开花气息”。据《群芳谱》所载：枇杷“秋萌、

序时，语言是文章的生命，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能力。向前首先的自觉，就是对语言运用的谨慎与认真。翻看他的作品，往往能让视线停驻在某一处语言的景象中。写作的自觉是很重要的，自觉能够始终保持清醒，即使听到不同声音，也会明晓而及时修正……不追求数量，而在意质量；不喜听表面嘉许，而在乎背后评价；不索取暂时赞誉，而追求长久播扬。总之，向前的这部融入多年心血的著作，确立了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。在这个语词喧嚣的时代，他以一种冷静的态度，独立煎熬，精心打造，保留了对汉语文字的敬意。

不止大礼堂，从岁月中走来的还有斋房、博雅楼、贡院……

漫步在校园中，我常常会忘了自己。是在每天的清晨，追着大礼堂的朝阳，在小花园练声的时候，我戒掉了松懈与偷懒。是在清闲的午后，数着贡院的光阴练习专业作业的时候，我忘记了时间与享乐。忧愁伤心的时刻，校园以安静的陪伴治愈着我。多么荣幸，一些难眠的夜晚，和那些永不回来的叶落花飞春回冬往，我都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里度过。

109周岁的河南大学，其承载的精神价值远超出我的想象。这一年中，我所领悟的精华，也只是河大百年风云的吉光片羽。但这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就像风与水之于大地，以一种潜移默化方式，不觉不知中塑造着我。

接下来的岁月。我将试着看到水的方向，听到风的声音，去主动发现和主动改变。真诚地希望，我能以一点一滴的积淀回报校园岁月的馈赠，与我的校园一起向阳生长。

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岁月留下不朽的诗篇。今年秋天，我的校园——河南大学，将迎来110周岁。何其有幸，我能在一所底蕴深厚的大学里成长；何其有幸，我能在校园中探寻时光的印迹。

回想去年10月1日的早晨，我和同学参加了学校的升旗仪式，共同庆祝新中国72周年华诞。国旗护卫队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，缓缓向升旗台走去。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边响起，五星红旗在校园内高高飘扬。蓝天白云之下，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因五星红旗的升起而显得愈加肃穆。即使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岁月，大礼堂依旧风采不减。

漫步大礼堂前，历史的一幕幕仿佛展现在眼前，1931年11月，大礼堂开始修建。历时三载，成了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建筑。然而，同一时期，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，全国陷入一片混乱。当时的河大师生和青年，选择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。马可投笔从戎，组建了怒吼歌咏队，以音乐的形式抗日。星海海在大礼堂前教唱抗战歌曲，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。不仅如此，在那段炮火连天、充满未知危险的岁月里，一位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有志青年，以大礼堂为起点坐标，流亡八年，故园办学，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于自身肩上，化作一束光，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。

漫步在校园中，我常常会忘了自己。是在每天的清晨，追着大礼堂的朝阳，在小花园练声的时候，我戒掉了松懈与偷懒。是在清闲的午后，数着贡院的光阴练习专业作业的时候，我忘记了时间与享乐。忧愁伤心的时刻，校园以安静的陪伴治愈着我。多么荣幸，一些难眠的夜晚，和那些永不回来的叶落花飞春回冬往，我都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里度过。

109周岁的河南大学，其承载的精神价值远超出我的想象。这一年中，我所领悟的精华，也只是河大百年风云的吉光片羽。但这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就像风与水之于大地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，不觉不知中塑造着我。

接下来的岁月。我将试着看到水的方向，听到风的声音，去主动发现和主动改变。真诚地希望，我能以一点一滴的积淀回报校园岁月的馈赠，与我的校园一起向阳生长。

短笛轻吹

我的校园

李蓉莹

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岁月留下不朽的诗篇。今年秋天，我的校园——河南大学，将迎来110周岁。何其有幸，我能在一所底蕴深厚的大学里成长；何其有幸，我能在校园中探寻时光的印迹。

回想去年10月1日的早晨，我和同学参加了学校的升旗仪式，共同庆祝新中国72周年华诞。国旗护卫队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，缓缓向升旗台走去。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边响起，五星红旗在校园内高高飘扬。蓝天白云之下，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因五星红旗的升起而显得愈加肃穆。即使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岁月，大礼堂依旧风采不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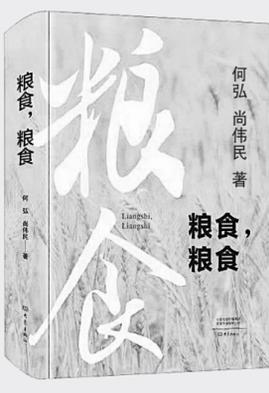
漫步大礼堂前，历史的一幕幕仿佛展现在眼前，1931年11月，大礼堂开始修建。历时三载，成了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建筑。然而，同一时期，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，全国陷入一片混乱。当时的河大师生和青年，选择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。马可投笔从戎，组建了怒吼歌咏队，以音乐的形式抗日。星海海在大礼堂前教唱抗战歌曲，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。不仅如此，在那段炮火连天、充满未知危险的岁月里，一位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有志青年，以大礼堂为起点坐标，流亡八年，故园办学，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于自身肩上，化作一束光，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。

漫步在校园中，我常常会忘了自己。是在每天的清晨，追着大礼堂的朝阳，在小花园练声的时候，我戒掉了松懈与偷懒。是在清闲的午后，数着贡院的光阴练习专业作业的时候，我忘记了时间与享乐。忧愁伤心的时刻，校园以安静的陪伴治愈着我。多么荣幸，一些难眠的夜晚，和那些永不回来的叶落花飞春回冬往，我都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里度过。

109周岁的河南大学，其承载的精神价值远超出我的想象。这一年中，我所领悟的精华，也只是河大百年风云的吉光片羽。但这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就像风与水之于大地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，不觉不知中塑造着我。

接下来的岁月。我将试着看到水的方向，听到风的声音，去主动发现和主动改变。真诚地希望，我能以一点一滴的积淀回报校园岁月的馈赠，与我的校园一起向阳生长。

连载



何弘尚 著 粮食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大约在16世纪中期，玉米叩开了中国的大门。史学界认为，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以下三条：一条是由西班牙传入，再由麦加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。另一条是由欧洲传入印度、缅甸，再由缅甸传入我国西南地区。第三条是由欧洲传入菲律宾，再由菲律宾传入我国。

“玉米”之名，最早见于明代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。而最早记载玉米种植的，则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成书的河南《巩县志》，称其为“玉麦”。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成书的《平凉府志》把玉米称作“番麦”和“西天麦”。但作为一种新引进的物种，玉米在明末清初的种植面积不大，人们对它的了解也很少。

1596年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初刊，里面虽附有玉米植株图，却把果穗画在了植株的顶端，可见作者对玉米并不熟悉。《农政全书》对同样刚从美洲传入的番薯记载得非常详尽，但对玉米却寥寥几笔，只在“薯蓣”一条中以注释的形式称：“别有一种玉米，或称玉麦，或称玉蜀黍，盖亦从他方得种，其曰玉米薯蓣，皆借名之也。”书中也没有谈到玉米的栽培方法及重要性。

初至我国的玉米，因为“物以稀为贵”，被视为珍稀之物，没有被列入粮食序列。明代田艺蘅在《留青日札》中说：“御麦出于西番，旧名番麦，以其曾经进御，故名御麦。”初步引种时期，玉米在我国并不是普遍种植，在人们的生活中谈不上有什么地位。直到清朝乾隆年间，玉米还是皇家专用的贡品。《盛京通志》中说：“玉米是‘内务府沅粉贡’。类似的情况还有花生，在乾隆年间同样是贡品。

18世纪中叶，广西的《镇安府志》把玉米列为“果属”，“以食小儿”。到了18世纪中至19世纪初，玉米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推广。这一时期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大批农民失去土地，流亡山林，而玉米特别适合山地种植。清史学家根据众多的方志资料统计，在乾隆至道光年间（1736~1850），全国已有直隶、盛京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等20个省区种植玉米了。

玉米在中国的名字也日渐丰富起来，有了很多别名：玉蜀黍、棒子、苞谷、包粟、玉菱、苞米、珍珠米、苞芦、大芦粟等。不同的方言也有不同的叫法，辽宁话称珍珠粒，潮州话称

慈米仁，粤语称为粟米，闽南语称作番麦。

玉米的适应性很强。无论气候寒冷、炎热、干燥、潮湿，无论山川沟壑还是旱田，无论是作为冬季作物还是夏季作物，无论是灌溉还是旱作，即使在年降水量10~200毫米的干燥地区，玉米都能生长，而且大多数年份都会获得不错的收成。科幻电影《星际穿越》开篇，地球因自然变化，大多数作物枯死，只有玉米依然顽强地生长，成为维持人类生存最后的食物。《星际穿越》以严谨的科学性著称，对玉米适应严酷环境的表现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
玉米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——即食性。水稻、小麦在成熟之后，需要经过晾晒，然后脱壳，将稻谷变成大米，将麦粒变成面粉，通过煮、蒸、弄熟，才可食用。玉米就简单多了，可以“乘青半熟，先采而食”，也就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掰下来直接吃。遇到荒年，这绝对是可以救命粮的。所以，玉米素来被称为“最宜备荒”的粮食作物。

可以说，玉米在中国的广泛种植，拉开了人口猛增的序幕。据史料记载，西汉末年到明朝中期的1500

年，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，视百年、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。”这说的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叶，即历史上的“康乾盛世”及稍后的那段时间，全国人口迅速增长。

清中期，也就是18世纪以后，玉米逐渐成为一些山区居民的主食之一。《云南通志》记载，康熙末年，玉米成为云南全省普遍种植的作物。湖北《建始县志》中载录：“邑境内山多田少，居民倍增，稻不足以给，则于山上种苞谷、洋芋、荞麦、燕麦或藏蕨之类。深耕剪伐殆尽，巨阜危峰，一望皆苞谷也。”乾隆年间贵州著名诗人郑珍写过一首《玉蜀黍歌》，形容当地广种玉米的情景：“只今弥漫满山谷，长稍巨干平坡陀……滇黔山多不遍稻，此丰民乐否谓堪……民天利俱在此。”

位于四川、陕西与湖北交界地带的大巴山和秦岭南麓，大部分为山区老林，明代以前这里人口稀少。因为战乱，荆襄一带的流民逃到这里开始垦荒。至清朝，随着人口不断增长，平原地区的贫弱民户也难以立足，纷纷移入山区垦荒。这里成为清代著名的移民流入地之一。这些移民，以超乎土著居民数倍的数量进入山区后，主要致力于玉米等旱地

作物的种植，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记述：“江楚民……熙熙攘攘，皆为苞谷而来。”到19世纪初，玉米在这里已经生根开花，取代了原来粟谷的地位，成为重要的主粮之一。

清朝乾隆以后，川中地区人口增加很快，除了一部分为自然增长外，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湖广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移民，史称第二次“湖广填四川”。这些移民入川后在水田已经垦殖殆尽情况下，只能开垦荒山，自然选择了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。大约嘉庆以后，玉米已在四川山区占据绝对优势，“山居广植以养生”“山民以作正粮”“山地多种之”“山地种之多茂，贫民赖以资生”。

19世纪中叶以后，玉米种植更加广泛，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地区。关中东部的民谣中有“苞谷下了山，棉花入了关”，说的正是玉米从山区发展到平原的史实。在产粮大省河南，19世纪中叶以后玉米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，至20世纪30年代，随着栽培技术的不断改进，玉米不仅单产超过谷子、高粱，而且种植面积也扩大到全省。地理位置偏北的河北省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玉米种植也已相当普遍，如遵化

“州境初无……后则愈种愈多，居然大田之稼矣……皆贫家之常食也”。玉米已成为宁夏、肃鹿、盐山、青县、迁安、卢龙、景县、静海、三河、香河等地农民的“恒食”“食品之最普遍者”。甚至在从来没有玉米的东北地区，随着清末的开禁，大批关内移民涌入东北，也带去了玉米种植技术。到20世纪30年代，玉米已成为奉天、新民、复县、凤城、宽甸、锦西等地的“农产大宗”“幽燕人民常食之品”。

玉米从传入中国到入山下山川，大约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基本上已经传播到中国大部分适宜种植的地区，成为当地百姓的重要辅食，有的甚至成为“终岁之粮”。20世纪中叶以后，玉米后来居上，其产量大大超过了谷子和高粱，跃居粮食作物的第三位，仅次于小麦和水稻（在全球范围内，玉米也是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），这对中国的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。1948年，国民党中央农林部统计资料显示，1947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12590万亩，总产1080万吨。